佛教的入世動力問題——評程恭讓教授新著對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譜系的建構

韓國茹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

程恭讓教授的新著《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為中心》（以下簡稱《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於 2017 年 12 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共 93 萬字，分上下兩卷。上卷以約 50 萬字的篇幅扣緊本書副標題「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建構了「最高（最後）的波羅蜜多」——善巧方便的譜系，並論證了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不即不離、不一不二、平衡開發、辯證彰顯的關係，重建了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人之父母一般之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並重的大乘佛教智慧學，為未來重新闡釋大乘佛教的內在本質、理解大乘教化的內在統一性，以及理解人間佛教的現代轉型奠定了佛學智慧基礎。

下卷對於魏晉以來中國佛教學者在佛典漢譯、理解及詮釋過程中，對於一些概念、思想，如實相、不二、淨土、無始時來界以及《寶性論》是否為漢傳佛教界所重視等問題，依據近年來新發現的梵語佛典，進行了新的理解與詮釋，有助於釐清中國佛教史上一些聚訟紛紜的概念思想，進一步作為佛教現代轉型可以借鑑的資源。

程教授具有深厚的梵文與佛典功底、精深的佛典理解與詮釋能力，以及近現代佛教研究之專長，其對於善巧方便之抉擇與建構並非只是一時之學術興趣，也並非針對某一個碎片化的、單一的佛學問題之專研，而是正如樓宇烈先生所作〈序一〉所言，是有其明確的問題意識的，[1] 這一問題意識是其二十幾年來學術研究中一直貫穿的主線。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之譜系的建構，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史的意義，另一方面具有極大的理論創新意義。

善巧方便這一「最高（最後）的波羅蜜多」的學理證成，及其對於佛陀本懷的開顯、大乘佛教本質內涵及大乘佛教思想的重新詮釋、中國化佛教思想價值的全新理解等所具有重大的意義，讀者諸君自可在通過閱讀該書而了然於心，筆者不再贅述。本文以下將從佛教的現代轉型形式——人間佛教的入世動力——這一點著重闡述其重大的理論意義。

佛教在現代化的衝擊下遭遇了種種的危機，國內外的學者對於這一危機的根源進行了諸多的解說。現代著名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以揭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選擇親和性關係聞名於世，在他關於佛教為什麼發展不出理性的經濟倫理——資本主義精神的重要特徵之一——的解說中，包括以下幾條論點：

第一，佛教的獨特成就在於其致力於追求「生前解脫」，而與此目標無關或者無助於達成此一目標的事情，無論其為此世的還是彼岸的，無論是社會的還是形而上的，甚至是對於涅槃的本質的知識的渴望，都可以而且必須不予理會。

1. 樓宇烈：〈序一〉，收入程恭讓著：《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頁 1。

第二，涅槃、開悟的唯一途徑是斷絕一切生之渴望所源出的偉大幻想，而不斷沉入真理的止觀冥想之中，即通過一種基於理想思惟的、純粹「無所關心」，也就是說，開悟與任何行動、行為無關，而只與冥想、禪定有關。因此，在韋伯看來，佛教的開悟並不是通過自己在任何一種——不管是世俗內的還是世俗外的——行為上的證明而獲得，換言之，無論是哪一種「積極的社會行為」都不能導向涅槃。韋伯因此斷言，開悟與理性行為世界之間根本無路可走、無橋可通。

第三，韋伯認為，佛教的救贖純然是個人的事，沒有神、沒有解救者，也沒有共同體可以幫忙。雖然佛陀是個正等覺者，只要還有人受苦，他決意不單獨尋求自我救贖而逃離這個苦難的世界。在這裡，韋伯用了一個與程恭讓教授新書共同的術語——善巧方便，來說明佛陀普度眾生的必要性：「讓他不這麼做（即不單獨尋求自我救贖，引者注）的是義務（upaya，用原本特色獨具的專用術語來說：方便）。」[2]

我們姑且不評論韋伯對於原始佛教的解讀是否準確，但是他對於佛教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即佛教在現代社會所遭遇的危機，在某種意義上與其過於重視禪定、般若，而忽視佛陀救世的「義務」（即程著中的善巧方便）有關——對於這一所謂「義務」，韋伯在同一段中這樣表述：「他不只是為了本身的自我救贖，而同時也是、並且特別是為了眾生的救贖。」這一點與程教授在其新著中的觀點頗為相契。程教授也認為，般若屬靜觀實相的智慧，而善巧方便則主要是導向實踐的智慧，也正是善巧方便的這一實踐性的品格，可

2. 參考馬克斯．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廣西師範大學 2014 年 9 月第 3 刷，頁 277-357。

以實現佛陀本懷與現代社會的互動與融合。

在韋伯的論述中，還有第二點可以予我們重要啟示。傳統佛教的解脫指向的是個人，尤其是作為僧侶的個人，而佛陀救世的「義務」的說法，擴大了佛教的實踐主體，雖然這一點還不是特別的明了，但是，社會化、大眾化的佛教實踐，則確實必須在善巧方便的德行基礎上始能展開。這一點也正是程教授在其《佛典漢譯、理解及詮釋研究》中所努力闡發的。

韋伯的問題意識以及思惟的視域都是非常獨特的，他從發生學的意義上探討佛教與現代性的關係，以旁證其新教倫理是唯一一個與資本主義精神有著選擇親和性的宗教。民國以來，尤其是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中國佛教界和學界對於佛教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實現佛教的現代轉型，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廣泛的實踐，下面我們以現代人間佛教卓越的創立者星雲大師（程恭讓語）的觀點，來說明佛教在現代中國衰落的原因。

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一書中，曾專闢一節「中國佛教衰微的原因」，其中第三點為「佛教走入山林，消極脫離社會」；第四點為「弘講談玄說妙，不重人文關懷」；第五點為「經懺密教鼎盛，道德信仰衰落」；第六點為「提倡鬼神信仰，殃及人間佛教」。[3]

星雲大師與韋伯的重大區別在於，大師從揭示佛陀本懷出發，認為佛教就是人間佛教，佛陀是眾中的一個，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弘法在人間，從來不缺乏入世的動力；從來都是社會化與大眾化的實踐模式：正如大師說：

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年版，頁 172-177。

> 佛教在中國輝煌興盛的原因，是因為提倡五戒十善的道德，倡導因果報應，獎善懲惡，可以說，佛教的戒律清規，維護了社會秩序。
>
> 人間佛教從事很多服務社會的事業，利國利民，尤其許多高僧大德學問淵博、道德高超，收到歷代帝王的尊重，發心護持佛教，人間佛教也契合人心，符合社會的需要，因此，佛教的發展就如日月光輝。[4]

佛陀是入世的，佛教的事業也是社會性的、大眾化的，佛教的發展才能繁榮。觀察佛光山的發展歷程，佛光山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以及佛光山的國際化發展等成就，充分證明了星雲大師的這一判斷。

用星雲大師自己的話來講，人間佛教發展繁榮的重要原則是契理契機，而契理契機的佛教智慧學所根據的就是善巧方便，因此程恭讓教授在其另外一本大作《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中曾經說，星雲大師是一位集般若與善巧方便兩種聖智於自己生命中的現代人間佛教導師，人間佛教是善巧方便智與般若慧交相輝映的佛教。[5]

程恭讓教授在《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一書中，對於善巧方便譜系的建構與證成是有理有據的，也是非常成功的。該書對於從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並重的角度重新理解大乘佛教思想史，以

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年版，頁 118。

5.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 年 3 月，頁 736-773

及現代人間佛教的理論建構，具有開創性的貢獻。在未來的研究中，有一個方向可能也非常重要。

我們注意到，程恭讓教授在《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中區分了世俗技術、技巧意義上的善巧方便和與般若智慧並重的善巧方便，也注意到了與般若智慧不即不離、不一不二、平衡開發、辯證彰顯的善巧方便，乃是佛、菩薩、聖者轉依所得的一種殊勝的智慧，是聖者的特殊能力，是聖德的祕密所在，在這一點上，善巧方便似乎是為佛、菩薩、聖者所專有，屬一種圓滿形態的智慧。而在現代人間佛教的脈絡中，更加強調自力拯救，如星雲大師說：

> 我們的人間佛教，要把自我提升，肯定自我，我有如來智慧德相，承認「我是佛」。這種對自我的提升，就是人間佛教的精神。不是把自己付予神權來控制，而是自己所有一切由自己來承擔。[6]
>
> 信仰的價值，就是自我的擴大、自我的昇華、自我的解脫、自我的圓融。我想，那就是人間佛教最後的目標，都要自我去完成。「做自己的貴人」，這就是佛陀。[7]

那麼，在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未來發展中，它是否可以發展，以及如何可以發展成為普通信眾成佛的實踐智慧，這一點恐怕是不能避開的。而且，因為善巧方便的實踐品格，在此概念思想主導的人間佛教未來的修行實踐，也必將發生重大的轉變，這些都是未來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6. 星雲大師：〈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年 8 月，頁 8。

7. 同註 6，頁 13。